

https://farid.ps/articles/sabra_and_shatila_massacre/zh.html

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

二十世纪初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存在微不足道：散布的农业**基布兹**，少数城市社区，以及主要限于礼仪和学术的希伯来语复兴。随着1933年的**哈瓦拉（转运）协议**和1938年的**埃维昂会议**，景观开始转变，这两者——以截然不同的方式——促进了从纳粹控制的欧洲犹太人的移民。几年内，移民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成倍增加，改变了人口平衡和这片土地的政治视野。

1917年贝尔福宣言，后来纳入**英国托管条款**，承诺支持“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民族家园”，同时——至关重要地——规定“不得做任何可能损害现有非犹太社区的公民和宗教权利的事情”。然而，从锡安主义运动的早期日子起，其领导层就将**征服和殖民化**视为通往国家地位的必要阶段。诸如西奥多·赫茨尔、海姆·魏茨曼以及后来的戴维·本-古里翁等思想家，并非辩论是否应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政权，而是如何在已有人居住的土地上保障并扩展它。

对于本土人口——穆斯林、基督徒和犹太人同样——在殖民托管下大规模移民的前景引发了焦虑和抵抗。1930年代末的阿拉伯起义反映了这样的恐惧：以欧洲迫害的避难所为幌子，在实践中已成为剥夺的工具。在奥斯曼统治下作为平行社区开始的东西，在英国监督下被重塑为竞争性的民族项目。

纳克巴

1947年11月，**联合国分治计划（第181号决议）**提议将土地分为两个国家，将**巴勒斯坦的56%**分配给犹太人口，当时他们约占居民的三分之一，并拥有约**7%**的土地。对于巴勒斯坦阿拉伯多数派，这似乎不是妥协，而是国际法令批准的剥夺。当社区之间爆发内战，英国撤军时，锡安主义力量迅速行动以保障并扩展分配给他们的领土。

到1948年，事件加速超出回忆。锡安主义准军事组织——特别是**伊尔贡和莱希**——对阿拉伯社区和英国行政当局的武装斗争扩展为公开叛乱。他们的爆炸和暗杀远超巴勒斯坦；一次袭击甚至打击了**罗马的英国大使馆**。精疲力竭且日益无法遏制暴力，**英国放弃了托管**，将巴勒斯坦的棘手问题移交给新成立的**联合国**。

结果是**纳克巴**——“灾难”——其中超过**70万巴勒斯坦人**在系统性的恐吓和破坏运动中被驱逐或逃离家园。村庄被夷为平地，家庭散布到邻近阿拉伯国家，一个民族社会几乎在一夜之间瓦解。联合国通过**第194号决议**（1948年12月）承认他们的困境，确认难民的返回或赔偿权。然而，这个承诺从未被执行。其未实施允许以色列巩固新边界，并让阿拉伯东道国将难民的存在视为**暂时的**——一种已持续超过七十年的临时状态。

巴勒斯坦侨民

1948年的暴力留下了废墟和流亡的景观。战斗中**1万至1.5万巴勒斯坦人**丧生，而数千人则在城镇和村庄陷落时的屠杀和驱逐中受伤。当代研究，包括历史学家瓦利德·哈利迪在**All That**

Remains中的细致记录，记载了超过400个巴勒斯坦村庄的破坏，其中一些完全从地图上抹去，其废墟后来被新的以色列定居点或犹太民族基金种植的森林覆盖，以掩盖居住痕迹。

到1949年夏天，难民人口达到约75万，来自战前120万阿拉伯人口。家庭成波逃离：首先从沿海城市如雅法、海法和阿卡；然后从加利利和中部高地，当锡安主义民兵——很快整合进以色列国防军 (IDF)——在达莱特计划下推进，这个战略蓝图授权清空被视为敌对或战略要地的地区。

邻国不均衡地吸收了人力潮。

- 约旦接收了最大份额，约35万，其中许多人后来获得约旦公民身份。
- 加沙，在埃及管理下，接收了约20万，使其狭窄地带膨胀成地球上最稠密地区之一。
- 黎巴嫩接收了约10万-12万，安置在匆忙建造的营地周围，如提尔、西顿和贝鲁特。
- 叙利亚接受了8万-9万，重新安置在围绕大马士革和阿勒颇。较小数量到达伊拉克和埃及本土，尽管这些难民往往再次迁移寻求稳定和工作。

联合国于1949年成立了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(UNRWA)，提供食物、住所和教育。然而，该机构的授权——旨在作为等待遣返的临时人道主义措施——成为永久 limbo 的脚手架。虽然第194号决议承认难民的返回权，但国际社会或新以色列国均未采取步骤实施。阿拉伯东道国引用同一决议拒绝授予公民身份，坚持这样做将使以色列拒绝遣返流离失所者合法化。因此，从一开始，1948年的难民就被夹在两个否定之间：返回的否定和归属的否定。

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

黎巴嫩，巴勒斯坦邻国中最小的，承受了与其规模和脆弱社会结构不相称的负担。当第一波难民在1948年越过其南部边界时，他们疲惫不堪，往往步行或骑驴，仅携带房屋钥匙和丢失财产的契约。1948年至1949年间，约10万至12万巴勒斯坦人进入黎巴嫩——约占战争创造的总难民人口的六分之一。新成立的联合国救济机构 (UNRWA) 到1952年注册了其中的12.7万，将家庭安置在提尔、西顿、的黎波里和贝鲁特郊外的临时营地。

黎巴嫩的接待受其自身宗派平衡塑造——马龙派基督徒、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以及德鲁兹之间的微妙权力分配——以及普遍恐惧，即授予数万主要逊尼派难民公民身份将破坏这一平衡。与后来将许多巴勒斯坦人归化的约旦不同，黎巴嫩让他们保持无国籍，提供居留但无国籍。他们被贴上客人标签，这个术语暗示临时保护和政治排斥。

最初，难民住在泥泞地块上搭起的帐篷中，依赖UNRWA配给和紧急援助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帐篷让位于锌顶棚屋，后来是混凝土棚屋，但他们的法律暂定性仍被编码。根据法律，巴勒斯坦人被禁止拥有财产、加入工会或从事七十多种职业，包括医学、法律和工程。营地与城市间的移动需要许可；教育和医疗访问依赖于始终资金不足的UNRWA系统。

最终形成了十二个官方营地，从西顿附近的艾因·希尔韦——现在黎巴嫩最大——到贝鲁特的夏蒂拉和布尔吉·巴拉杰内。很快，拥挤达到了惊人的密度：在夏蒂拉，3万人生活在不到半平方公里内。基础设施最小；污水和供水系统腐朽；电力每天闪烁几小时。然而，在贫困中，营地也成为韧性空间——学校、诊所和政治组织维持着根植于返回权的集体身份。

黎巴嫩当局，在政治建制大部分的支持下，坚持巴勒斯坦人的存在是暂时的。这一坚持不仅是人口统计学的，而是意识形态的：整合难民，论证认为，将溶解他们必须有一天返回家园的声明本身。因此，**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流亡既是人道状况，又是政治声明**——阿拉伯世界誓言永不仓促愈合的伤口的可见证词。

返回权

几十年来，营地不仅是流亡的地理学，而且是缓慢燃烧的道德紧急情况。想象一下在帐篷巷子里出生的一代代人，你祖父母的房子只存在于枕头下保存的钥匙的记忆中——那里反复且正式地告诉你，你可能永远不属于那里。经过三十多年**返回权**仍为纸上承诺，联合国决议回荡但未执行，东道国将流离失所视为临时行政问题，黎巴嫩的许多巴勒斯坦人面临严峻算术：无公民身份、有限工作、受限教育、无法律途径收回土地或尊严。贫困不仅仅是物质的；它是法定的：由使永久性不可能的法律和政策产生和强化的状况。

很难看出这种状况如何激进化。当外交补救停滞，国际机构未能提供执行时，普通人往往抓住触手可及的工具——先是组织政治，然后对一些人来说是武装抵抗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（PLO）及其构成游击队的兴起必须对照这种剥夺背景阅读。对于许多难民，拿起武器不是抽象意识形态，而是对日常羞辱的具体回应：否定基本公民和经济权利、封锁边界、缓慢抹除家园。对于1948年目睹村庄被夷平和邻居被驱逐的人口，然后看到国际系统承认他们的权利却不执行，暴力开始看起来是唯一能产生注意、杠杆和——无论多么悲剧地——安全的语言。

这种人类逻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武装派系在营地及其周围建立基地，为什么他们在那组织社会服务，为什么营地随着时间军事化。它不免除随之而来的伤害。越过以色列边界的游击行动邀请报复，主要落在平民身上；集体惩罚加深了黎巴嫩人的恐惧，并为更严厉措施提供了借口。简而言之，向力量的转向创造了反馈循环：无国籍和边缘化推动难民人口的部分向激进主义；激进主义引发军事回应和政治去合法化；这些回应强化了难民的排斥。

这样看，1982年的入侵——以及随后在萨布拉和夏蒂拉的大屠杀——不是自发的断裂，而是由失败权利、截断补救和升级报复循环锻造的链条的灾难性终点。道德复杂性显而易见：产生营地 limbo 的国家和国际系统对创造人们感到被迫抵抗的条件负责——但采取暴力形式的抵抗，尤其是针对平民的，也产生新受害者和扩道德深渊。

抵抗权

国际法本身为这些选择后来如何被正当化提供了一些基础。根据**日内瓦第四公约**和**1977年附加议定书 I**，生活在**外国占领**下的民众有权抵抗该占领——包括在某些情况下以武装手段——只要这种抵抗尊重针对平民的禁令。联合国大会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多次重申这一原则，在决议中承认“殖民和外国统治下人民斗争的合法性，以行使他们的自决权”。

这些条款是否适用于**生活在流亡中的**巴勒斯坦人而非直接占领下是辩论的焦点。他们的土地和家园仍由以色列国控制，但他们自己被关押在邻近领土，被拒绝返回，并事实上无国籍。对于许多巴勒斯坦思想家和法学家，这种流亡并未废除抵抗权；它只转移了战场。在他们看来，武装抵抗权扩展到那些**占领跟随他们穿越边界**的人民——通过驱逐、封锁和对难民营本身的军事入侵。

在实践中，这些法律论点几乎没有改变所经历的现实：以色列视所有来自黎巴嫩土地的武装活动为侵略，而黎巴嫩则将难民战士视为客人兼负担。结果是一个国中国——**PLO在黎巴嫩南部的准自治存在**——被一些派系容忍，被其他派系鄙视。随着1970年代推进，营地不仅成为剥夺的象征，还成为扩展区域冲突的前线。

PLO在黎巴嫩

到1960年代末，黎巴嫩的难民营已成为流亡中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中心。1967年**六日战争**和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的占领后，巴勒斯坦抵抗团体散布在阿拉伯世界，其在约旦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基地成为跨国斗争的节点。

1970年9月，约旦君主制在被称为**黑色九月**的血腥内战后驱逐了PLO。数千名战士越过边界向北逃往黎巴嫩，那里的营地既提供庇护，也提供现成新兵。这一涌入改变了黎巴嫩的政治平衡。PLO建立了平行行政——通过其**巴勒斯坦红新月会**管理学校、医院和福利系统，同时组织武装翼如**法塔赫**、**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 (PFLP)** 和 **巴勒斯坦解放民主阵线 (DFLP)**。

对于许多难民，PLO的到来象征赋权：1948年以来首次，巴勒斯坦人不仅是援助接收者，而是自身命运的代理人。然而，对于黎巴嫩政治建制的大部分，这看起来像国中国。越过北部以色列边界的突袭吸引了报复性空袭，杀死黎巴嫩平民并摧毁基础设施，加深了未选择托管战争的社区的怨恨。

黎巴嫩国家和PLO之间不稳定的共存通过1969年**开罗协议**正式化，由埃及斡旋。它授予巴勒斯坦人在营地内有限自治和携带武器抵抗以色列的权利——对黎巴嫩主权领土的空前让步。一段时间，这个安排维持了脆弱平衡：黎巴嫩可以声称与巴勒斯坦事业的团结，同时卸下对难民福利和安全的责任。

但随着黎巴嫩自身宗派紧张加剧，这个安排瓦解了。PLO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增长，将其与黎巴嫩**1975-1990年内战**中的左翼和穆斯林派系结盟，而右翼基督教民兵，特别是**法朗基斯**，开始将巴勒斯坦人视为人口威胁和外国军队。法朗基斯与PLO相关力量的冲突在贝鲁特和南部爆发，将街区和营地变成前线。

以色列，观察着边境对面的混乱，开始将黎巴嫩视为不仅仅是安全威胁，而是机会。以色列领导层寻求军事上中和PLO，同时培养与分享共同敌人的基督教民兵联盟。从1970年代末开始，以色列向**南黎巴嫩军队 (SLA)** 和 **法朗基斯运动**元素提供武器、训练和后勤支持，有效地在北部边界建造代理力量。

1978年3月，在PLO袭击以色列沿海高速公路杀死三十八名平民后，以色列发动了**利塔尼行动**，入侵至利塔尼河，杀死一千多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。尽管行动被正当化为反恐措施，其潜在目标是将PLO向北驱逐并建立由SLA巡逻的缓冲区。**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(UNIFIL)** 被部署作为回应，但其授权薄弱，其存在主要是象征性的。

接下来的几年见证了升级循环：PLO突袭、以色列空袭、报复炮击和双方逐步根深蒂固。到**1981年**，以色列官员声称每年超过两百以色列人死于跨界射击，而黎巴嫩城镇则遭受常规轰炸作为回

报。在同一时期，**阿里尔·沙龙**，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，构想了一个更广泛的计划——军事上粉碎PLO，将其逐出黎巴嫩，并在贝鲁特安装一个友好的基督教领导政府。

1982年入侵：加利利和平行动

1982年6月6日，以色列在代号**加利利和平行动**下对黎巴嫩发动全面入侵。官方上，声明的目标有限：将巴勒斯坦游击队向北推40公里以停止跨界火箭射击。实际上，行动范围由国防部长**阿里尔·沙龙**更雄心勃勃地划定，并由总理**梅纳赫姆·贝京**批准。未公开目标包括摧毁**PLO的军事和政治基础设施**，将其领导逐出黎巴嫩，并在贝鲁特安装一个亲以色列政府，由马龙派法朗基斯领导**巴希尔·杰梅尔**。

进攻规模揭示了其真实意图。近**6万以色列士兵**，由**800辆坦克、装甲旅和空军中队**支持，在沿海岸、中央高地和东部贝卡谷的协调突击中越过边界。入侵迅速淹没了UNIFIL阵地和黎巴嫩村庄，在几天内远远超过40公里限制。到6月8日，以色列部队占领了**提尔和西顿**；到6月14日，**贝鲁特**本身被包围——一个近百万平民的城市，现在处于围困中。

人力成本惊人。根据黎巴嫩政府估计，约**17,000-18,000人**——压倒性多数平民——在战争初期阶段丧生，数千人受伤。西顿和西贝鲁特的整个街区在持续轰炸下夷平。现场记者，包括**罗伯特·菲斯克**和**托马斯·弗里德曼**，描述了世界末日般的破坏场景：烛光运行的医院、巷子里堆积的尸体，以及搜寻水源时举着白旗的孩子。

贝鲁特围困

到6月底，PLO剩余战士——约**11,000人**——在西贝鲁特挖壕沟，被IDF从陆、海、空包围。围困持续近十周。以色列炮兵和空袭日夜轰击人口稠密街区，切断电力、食物和医疗供应。加沙医院和马卡塞德医院不堪重负。死亡人数每日上升。西方外交官将轰炸比作斯大林格勒围困，指出以色列针对被困平民的火力“完全不成比例”。

国际愤怒高涨。联合国安理会在第508号决议中谴责入侵，要求立即停火。美国特使**菲利普·哈比布**不懈谈判以斡旋停火。经过数周压力，1982年**8月**达成协议：

- PLO将从贝鲁特撤离，在由美、法、意部队组成的**多国部队 (MNF)**保护下。
- 以色列将停止推进并保证留守平民的安全。
- MNF将临时留守监督过渡并防止报复。

8月21日至9月1日，近**14,400名PLO战士**及其家属从贝鲁特出发前往突尼斯、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。撤离在国际监督下进行，当时被誉为外交成功——围困的有序结束，可能最终稳定黎巴嫩。

但和平被证明是幻觉。以色列未如承诺从贝鲁特外围撤军；其部队仍部署在城市周围。**9月14日**，仅在最后一支PLO车队从港口出发几天后，一场巨大爆炸撕裂了东贝鲁特的法朗基斯总部，杀死了总统当选人**巴希尔·杰梅尔**——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和沙龙战后政治愿景的基石。暗杀，被归因于叙利亚社会民族党成员，粉碎了以色列的计划，并将黎巴嫩重新拖入混乱。

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

当以色列坦克于1982年9月15日进入西贝鲁特时，萨布拉社区和毗邻的夏蒂拉难民营位于他们迅速封锁的区域内。这些是人口稠密地区，估计20,000–30,000平民的家园，主要为巴勒斯坦难民和贫穷黎巴嫩什叶派家庭。最后的PLO战士两周前离开了城市。剩下的是手无寸铁的平民——男人、女人、孩子和老人——相信他们受美国和以色列保证的停火保护。

巴希尔·杰梅尔，法朗基斯领袖的暗杀提供了复仇借口。9月16日下午，国防部长阿里尔·沙龙和参谋长拉斐尔·埃坦在贝鲁特国际机场附近的IDF前线指挥所会见了法朗基斯指挥官，包括埃利·霍贝卡。法朗基斯——以色列的亲密盟友——被授权进入营地“根除恐怖残余”。以色列军官协调后勤，提供运输，并用部队和装甲车包围区域。他们还整夜发射照明弹以便利民兵行动。

一旦进入，法朗基斯部队开始无差别杀戮。在接下来的四十小时内，从周四晚上到周六早上，他们从家到家移动，处决整个家庭，侵犯妇女，并用推土机将尸体推入集体坟墓。许多受害者近距离枪杀；其他人被刀或手榴弹杀死。幸存者后来描述街道上排列的尸体和空气中弥漫的腐烂臭味。

在大屠杀期间，以色列士兵维持了营地周围的警戒线，控制进出点。暴行报告几小时内通过无线电过滤到以色列指挥官。国际红十字观察员和附近街区的记者也向IDF军官报告了大规模杀戮。然而，军队没有干预。杀戮持续了近两天，直到民兵在9月18日上午8:00在国际愤怒和美国直接抗议后终于被命令撤出。

伤亡和证据

死亡人数仍有争议，但任何计算都恐怖。

-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报告至少1,500具尸体被恢复，总死亡人数可能达到3,000。
- 联合国大会调查(1982)估计2,750至3,500人死亡。
- 以色列卡汉委员会确认700–800已识别受害者，但承认许多其他人丧生。

死者中包括巴勒斯坦人、黎巴嫩什叶派和少数叙利亚人——几乎全为平民。

责任和共谋

尽管大屠杀由法朗基斯民兵执行，但以色列指挥结构在使行动可能的参与是不可否认的。以色列部队：

- 授权法朗基斯进入营地。
- 包围区域，阻止平民逃离。
- 照亮夜空以便利杀手。
- 收到大规模杀戮报告，却近两天无所作为。

当首批国际记者——包括罗伯特·菲斯克、洛伦·詹金斯和珍妮特·李·史蒂文斯——于9月18日进入夏蒂拉时，他们发现噩梦：尸体堵塞的巷子、推土机坑满是尸体，以及震惊中徘徊的幸存者。这些图像灼烧了全球意识，并粉碎了以色列寻求“加利利和平”的主张。

调查和全球反应

大屠杀引发了立即的国际愤怒。联合国大会在第37/123号决议（1982年12月）中谴责其为“种族灭绝行为”，并认定以色列对未能防止它负责。在以色列本身，公众愤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：估计40万人——近人口的十分之一——在特拉维夫游行要求问责。

在公众压力下，以色列政府于1983年成立了卡汉调查委员会。其发现是谴责性的，尽管措辞谨慎。委员会裁定：

- 以色列对大屠杀承担“间接责任”。
- 阿里尔·沙龙“个人负责”未能采取行动防止流血，尽管有明确警告。
- 其他高级官员，包括拉斐尔·埃坦，承担“个人过失”。

沙龙被迫辞去国防部长职务，尽管留在内阁，并二十年后成为总理。没有以色列或法朗基斯军官因大屠杀而被刑事起诉。2001年，幸存者通过针对沙龙和其他人的比利时战争罪案寻求正义，但该案于2003年因管辖权问题被驳回。

多国部队（MNF）——其先前撤离使营地无保护——于1982年9月底返回贝鲁特，但其存在无法逆转已发生的事。在数月内，新暴力爆发：针对美国和法国部队的自杀式爆炸、西方部队的撤离，以及黎巴嫩更深深地陷入混乱。在西贝鲁特废墟中，萨布拉和夏蒂拉的幸存者将死者埋葬在匆忙挖的集体坟墓中，并开始了漫长而隐形的哀悼工作。

在黎巴嫩，萨布拉和夏蒂拉加深了宗派伤口。对于基督教民兵，它巩固了罪责和报复的遗产；对于什叶派和巴勒斯坦社区，它成为集结苦难和不公的象征。内战又持续了八年，留下约15万人死亡，直到塔伊夫协议（1989）终于恢复了脆弱和平。然而，难民仍被排除在该协议的国民契约之外，仍无公民身份或财产权，仍被关押在父母和祖父母家园的营地中。

国际上，大屠杀暴露了缺乏政治意愿时人道法界的局限。联合国决议、日内瓦公约和新兴的“保护责任”概念都宣告了防止暴行的义务，但没有一个转化为有效执行。2000年代初的比利时战争罪案短暂重开问责问题，但最终被管辖改革限制。到今天，没有法庭裁决萨布拉和夏蒂拉的杀戮。

文化上，大屠杀作为伤口和镜子持久存在。电影如阿里·福尔曼的《与巴希尔共舞》（2008）探索以色列士兵对共谋的萦绕记忆；文学作品如埃利亚斯·胡里的《太阳之门》和罗伯特·菲斯克的《怜悯国家》以灼热亲密记录人类毁灭。对于巴勒斯坦人，每年9月的周年纪念少于纪念，更像是连续性的仪式——提醒同样的无国籍状态在1982年让他们无保护，今天在黎巴嫩营地和被占领土上持续。

四十年后，萨布拉和夏蒂拉不止是历史插曲；它是道德地标。它迫使面对未愈移居、未执行承诺、未挑战的免责后果。它显示，当整个民族被剥夺法律归属时，暴力不是偏差，而是等待其时刻的必然。

大屠杀幸存者现在年老，他们的记忆淡入历史记录，但他们的证词作为警告持久——无国籍者的权利是世界良知的尺度。最终，萨布拉和夏蒂拉不仅仅是大屠杀的故事；它是二十世纪未完之问的故事：正义能拖延多久，直到历史重演？

尾声：流亡的地理

纳克巴和萨布拉和夏蒂拉不是孤立悲剧，而是单一连续体的章节——人类被权力致盲、法律宣告却未执行、记忆被武装并轮流遗忘的历史。这个链条的每个时刻提醒我们，未被承认的苦难在新形式和新土地上再现自身。

正义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修辞。然而，那些记住者的持久——仍握有消失家园钥匙的幸存者、在难民营长大的孩子仍等待返回——见证了不可摧毁的事物：拒绝让抹除成为最终判决。

如果这个历史有教训，那就是建立在剥夺上的任何安全都无法持久，排除正义的任何和平都无法持久。直到流离失所者的尊严生活权——无论返回或认可归属——被尊崇，流亡的地理将继续扩张，萨布拉和夏蒂拉的幽灵将与我们所有人同行。

参考文献

- Al-Hout, B. N. (2004). **Sabra and Shatila: September 1982**. London: Pluto Press.
- Arens, M. (1982). Statements to the **Washington Post**, June 1982.
- Brynen, R. (2022). **Palestinian Refugees in Lebanon**. Beirut: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.
- Fisk, R. (1990). **Pity the Nation: Lebanon at War**.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Folman, A. (Director). (2008). **Waltz with Bashir** [Film]. Sony Pictures Classics.
-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. (1947). **Resolution 181 (II): Future Government of Palestine**.
-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. (1948). **Resolution 194 (III): Palestine - Progress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Mediator**.
-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. (1982). **Resolution 37/123: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**.
-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(ICRC). (1982). **Field Reports on the Lebanon Conflict**. Geneva.
- Israeli Government. (1983). **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Events at the Refugee Camps in Beirut (Kahan Commission)**. Jerusalem: State of Israel.
- Khalidi, W. (1992). **All That Remains: The Palestinian Villages Occupied and Depopulated by Israel in 1948**.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.
- Khoury, E. (2006). **Gate of the Sun**. New York: Archipelago Books.
- Peteet, J. (2005). **Landscape of Hope and Despair: Palestinian Refugee Camps**. Philadelphia: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.
-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. (1982). **Resolutions 508 and 521 (1982): Ceasefire and Situation in Lebanon**.
- Shlaim, A. (2000). **The Iron Wall: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**. New York: W. W. Norton.